

陈延斌 著
郭建新

三教九流



中国文史出版社

B2-49

2

三教九流

陈延斌
郭建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特约编辑：戴子善
朱荣康
责任编辑：孙晓鸥
韩淑芳
题 字：徐伯生
版式设计：张荣盛
刘永涛

三 教 九 流

陈延斌 著
郭建新等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东华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1991年5月第一版，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字数：195千字

印数：6001~23000册

ISBN 7-5034-0384-5/C·009

定价：3.95元

目 录

三教九流与中国古代文化(序)……徐少锦 (1)

三教篇

一、“道冠古今 德侔天地”

——儒教…… (22)

§ 1. 儒教：独特的宗教…… (22)

§ 2. 孔子缘何成了教主…… (26)

§ 3. 孔庙与祭孔仪礼…… (28)

二、“阿弥陀佛”

——佛教…… (34)

§ 1.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34)

§ 2. 佛祖的传说…… (36)

§ 3. 佛教的基本教义…… (38)

§ 4. 中国佛家常识点滴…… (44)

三、修道炼丹 羽化登仙

——道教…… (51)

§ 1. 张天师创教与道教小史…… (51)

§ 2. 教义与清规戒律…… (64)

§ 3. 炼丹、道场、法术、修行…… (70)

§ 4. 道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77)

九流篇

一、忠孝仁义 道德文章

- 儒家…………… (84)
- § 1. 从“儒”谈起…………… (84)
- § 2. “至圣先师”——孔子…………… (87)
- § 3. “亚圣”——孟子…………… (98)
- § 4. 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 (104)
- § 5. “汉代孔子”——董仲舒…………… (109)
- § 6. 宋明儒家…………… (113)

二、老庄·《道德经》·《逍遥游》

- 道家…………… (124)
- § 1. 老子其人，《老子》其书…………… (124)
- § 2. 庄子与《逍遥游》…………… (130)
- § 3. 黄老之学…………… (136)
- § 4. 魏晋玄学…………… (139)

三、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 墨家…………… (144)
- § 1. 墨家：何以名“墨”…………… (144)
- § 2. 墨家：与儒家抗衡的先秦“显学”…………… (145)
- § 3. 墨子：著名的利他主义者…………… (147)

四、白马非马 诡辩乎？

- 名家…………… (154)
- § 1. 名家渊源与有趣的辩学…………… (154)
- § 2. 舌巧如簧的邓析…………… (156)
- § 3. 口若悬河的惠施…………… (158)

§ 4. 能言善辩的公孙龙·····	(163)
五、变法改革 以法治国	
——法家·····	(172)
§ 1. 法家渊源及其代表·····	(172)
§ 2. 前期法家：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	(174)
§ 3.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	(177)
六、合纵连横 朝秦暮楚	
——纵横家·····	(182)
§ 1. 七国争雄，说客纷纷登台·····	(182)
§ 2. 苏秦“合纵”，身佩六国相印·····	(185)
§ 3. 张仪“连横”，全凭三寸之舌·····	(188)
七、兼容儒墨 合取名法	
——杂家·····	(192)
§ 1. 吕不韦悬赏：一字千金·····	(192)
§ 2. 杂家之“杂”：儒墨名法·····	(196)
§ 3. 《淮南鸿烈》：拼盘杂烩·····	(199)
八、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阴阳家·····	(202)
§ 1. 伏羲画八卦：阴阳家溯源·····	(202)
§ 2. 阴阳家与阴阳家书·····	(205)
§ 3. 阴阳家巨子——邹衍·····	(207)
九、君民共耕	
——农家·····	(212)
§ 1. 神农教耕的传说·····	(212)
§ 2. 农家之书·····	(213)
§ 3. 许行“君王亲耕”的空想·····	(216)

附：

一、我国民间的“三教九流”

……………王文正 黄 山 (218)

§ 1. 概说民间“三教”…………… (218)

§ 2. 漫话民间“九流”…………… (225)

§ 3. 民间“九流”所尊奉的神仙和祖师… (240)

§ 4. 民间九流的另一些说法…………… (246)

二、三教九流主要代表人物介评

……………张荣盛 (258)

后记…………… (283)

三教九流与中国古代文化(序)

徐少锦

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一般人提到的“三教九流”，多半指江湖上各种行当，各色人物，并且是带有贬意的。很少有人了解它含有泛指宗教、学术领域中各种流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概括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这层意思。

“三教九流”是“三教”和“九流”的合称。而三教有不同说法。如《白虎通·三教》说：“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之。”汉代的儒家认为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他们把夏、商、周三代所崇尚的忠、敬、文这些道德规范与礼仪文饰，总称为三教。但是，本书中所讲的三教，是指儒教、道教、佛教。佛教在东汉初才传入中国，传入后又发生了与儒、道的关系问题。于是在公元573年，北周武帝亲自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辨释三教先后”问题，最后作出了“儒教在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北史·周高祖纪》）的结论。在西汉以前，根本不存在这三教问题。但“九流”却早已存在了。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解释，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这九种学术上的流派，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了。所以，从思想形成的先后来讲，九流在先，三教在后，“三教九流”改为“九流三教”更为确切。“三教九流”四字合用，恐怕要到宋

朝，最初在上层使用它，以后流传到社会上，成为平民百姓的口头语，含意也随之有些变化。如《水浒传》七十一回在评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将时说：“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与“贵”者相比，三教九流大体上属于“贱”者。

本书对“三教九流”的论述是从学术文化着眼的。中国古代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仅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物遗址，还保存了浩繁的文化典籍，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资料和工艺美术珍品。这显然是不能用“三教九流”加以概括的。因为不仅农家、墨家、阴阳家并不囊括全部自然科学技术，而且文学艺术也大都排除在外，未予入“流”。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九流”大体上可以概括先秦时期精神文明的状况，“三教”则反映了我国东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中思想文化的主导方面，它支配和影响了古代整个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科技的发展。因此，比较具体地介绍它们，并多方面地揭示它们与上述各个领域的联系，对于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是不无裨益的。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唇枪舌剑，往返辩驳，思想学术界生气勃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表现出很高的智慧和雄辩才能，产生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学派。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提倡忠恕，主张实行德治仁政，目的是“助人君顺阴

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但孔子的思想没有得到鲁国统治者的重视，他在鲁国只当了几年官便去职。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然而均不为所用，四处碰壁。虽然处于被逐、被侮，甚至被杀的境地，但他仍然孜孜以求学问，谆谆教诲学生。孟子继承孔子的事业，继续到各国推行儒家的主张，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到过齐、魏、宋、滕、邹等大小国家，经历了与孔子类似的遭遇，他在鲁国“不遇鲁侯”；在邹国，穆公不给他赠金，使“孟子……绝粮于邹、薛，困殆甚。”（应劭：《风俗通·穷通》）“适梁，梁惠王……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不器重他。他也以聚徒讲学了其终生。

孔孟儒家的政治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各国统治者的重视，而且其学术思想也遭到墨、法、道等各家的非难。连“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也”的杨朱一派，一度也成为“显学”，而与儒家争高竞长，道家也是这样。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儒家讲的道德，是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老子讲的道德是无为、自然、无知、无欲、柔弱、不争。两者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各家各派之间也有某些共通的因素。儒家的中庸之道与老子的“中正之极”有共通处。孟子虽然反对农家的“君民共耕”和墨子“兼爱”的主张，反对争城夺地的流血战争，但孔子提倡孝悌，讲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则与农家重视农业、墨家“以孝视天下”、兵家重视武备的思想、法家奖励耕战的主张，又有一致的地方。

儒家提倡仁爱、仁政，并不反对用法、用刑、用兵。孔子对郑国统治者镇压奴隶大起义就说过赞扬的话：“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而法家韩非虽然表现出非道德主义倾向，但并不是完全否定道德，实际上是把封建道德法律化，加强它的权威，他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而天下治，三者逆而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这是“三纲”的雏型。其他如阴阳家的“敬授民时”，名家的“名位不同，礼也异数”等也与儒家有共通之处。至于杂家，更是“兼儒、墨，合名、法”，与其他学派一致的地方更多。还有纵横家，“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以其雄辩之才，效忠人君，亦为儒家所肯定。总之，先秦时各家各派，“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它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为其政治、军事、经济利益服务。然而，“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正因为这样，各派在对立之中有同一。特别是儒家，它所包容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更多些。这是它在秦以后历史发展过程取代其它各派而取得独尊地位的内在依据。

儒家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与保持统治地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汉高祖刘邦是轻视儒生的，说天下是自己骑在马上打出来的，而不是读《诗》、《书》读出来的（《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道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但陆贾等思想家还是提醒他，在重视刑罚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教化，实行德治，指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倾巢破卵之患”（《新语·辅政》），“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

劝善”（《新语 无为》），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儒家仁义道德是治天下不可缺少的手段。汉初的思想政治家反思秦朝覆灭的教训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礼与法是相辅相成的，“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两者都是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这就促使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结合。

实际上，随着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综合战国以来各家各派政治学术思想，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出现的。董仲舒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中心，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形式，把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以封建君权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这个体系同孔孟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它吸收了先秦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的唯心主义循环论和当时儒生方士建立的统摄“五德”、“五帝”的“太一”至上神（天子就是天上的这个主宰在地下的代表），对神权与王权之间的联系作出了理论说明，为王权神授、臣民尽忠君王的必要性进行了哲学论证。这个经过加工改造了的新儒学，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有通晓儒家学术的人才能做官；结束“会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混乱状况；以达到“邪辟之说息灭”，“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汉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对策三》）的大一统目的。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在太学中专设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教育地主、贵族子

弟；并用儒学标准选用官吏。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学术文化发展起着支配作用。

二

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土生土长的道教，随着力量的壮大，便起来与儒教争夺教主地位。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儒学受到道、佛两教特别是佛教的严重挑战。这是因为，儒学的政治伦理、纲常名教虽然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能够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但它在理论上有一个弱点，就是与佛、道相比，哲理思辨性不强，对封建道德的基础理论缺乏细致的分析与严密的论证，在孔子那里，“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汉儒或琐琐于经典的注疏考释，不能充分阐发义理；或用粗俗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神学，作牵强比附的所谓证明，结果反而被农民起义所利用。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就制造了“苍天当死，黄天当立”的谶语，作为发动、组织起义军的思想武器。当然，黄巾军也利用了道教《太平清领书》中的某些信条，从而证明道教既可为封建统治者也可为被统治的农民阶级所利用的两重性，需要加工改造。佛教主张“出世”、“不敬王者”、“不拜父母”，也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它作为外来宗教，为了在中国大地上争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不得不竭力使其教义与儒家伦理接近，同刑政教化相协调，发挥其“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弘道集》卷十一）的作用。华严宗五祖宗密（780—841）幼通儒书，他以仁义礼智信“五常”配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五戒”，企图把儒学纳入佛教理论

体系之中，在人生和道德方面把儒佛调和起来。从唐代起，有些佛教徒逐渐改变不敬王者、不拜父母的做法而宣扬忠孝，寺庙上香高颂“皇帝万岁万万岁”，宋代名僧契嵩作《孝论》，论证戒孝合一，赞美父母养育的恩德。有的佛庙把以忠义著称的关公同观音菩萨等一起供奉为神。

道教与佛教之间存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矛盾。这中间既有民族感情问题，也有争夺正宗地位问题。道教作为一种本土宗教，虽然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支持，但先天不足，不象佛教那样有自己深厚的理论基础，它虽然把老子作为自己的教主，但老子本人并未创立道教。《老子》、《列子》、《文子》等古籍中有些思想可以为道教所利用，但把它们作为道教经典则很勉强。尤其是，教道宣扬修道成仙，并鼓吹能用炼不老丹的方法使人长生不死，这种当世见报的说教，在实践中屡屡失败，不如佛教“不求当世，但求来生”，轮回转世的说教更能欺骗人。所以，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儒家的攻击，而且也受到佛教的挑战。三国时曹植作《辨道论》，对方士的“辞繁寡实，颇切怪言”就提出了责难。为此，道教徒吸取经验教训，作出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仿效佛教的戒律与宗教仪式，来制定其戒规和斋戒谈经等形式，甚至把佛教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也引入道教，使道教理论逐步完备化和宗教形式逐步规范化。与此同时，又编造谎言，说老子西游到印度创造佛教，佛祖如来就是老子的弟子。不过，僧侣也变本加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佛派了三个弟子来教化中国，他们就是孔子、颜渊、老子。这种斗争伎俩当然是不高明的，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另一方面，道教上层人物在坚持道本儒、墨末、道高于儒佛的前提下，力求与僧、佛等各家各派协调起来。如曾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后来舍僧入道的葛洪，在将原始道教理论化、系统化、官方化的过程中，提倡内道外儒，主张对儒、墨、名、法兼收并蓄，“全儒墨之善，总名德之要”，偷偷地将儒家思想引入道教，宣扬“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皆不得长生也。”但不准崇儒贬道，因为“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詈祖考哉！”（《抱朴子·内篇》）葛洪一生由儒入道，目的是以道、儒治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表现出身处乱中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的人格特点，也反映出官方道教的虚伪性、政治性。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以儒家纲常伦理来充实自身。如《道教二十七戒》中有“不伤王气”条，《云笈七签》所提倡的九行中有“忠孝、知足、推让”三行，以求得与世俗生活的一致。

儒家在发展过程中也感到有吸收佛、道思想的必要。老庄提倡无为不争、消极避世、不讲功业、菲薄仁义、在幻想中求自由，这与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自强不息、谋求功名利禄，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的和道德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但老庄深奥的哲理，表现出深邃的智慧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以及清心寡欲的人生态度，则成为一部分失意的知识分子的处世良方。因此，也有人主张儒道融合。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家就是这样，他们援道入儒，企图借助其精致的思辨形式，调和老庄与儒学的矛盾。在儒佛关系方面，东晋时孙绰（314—371）作《喻道论》，宣扬“周（公）、孔（子）即佛，佛即周、孔”，“周、孔救极弊，

佛教明其本”。这是站在儒学立场上，企图调和儒佛的先声。唐代韩愈“攘斥佛、老”，但他用以对抗佛教的“道统”说，却仿制了佛教的“法统”说；他主张对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却又肯定佛教去杀劝善的伦理思想有助于教化。柳宗元批判了因果报应和各种神学迷信，但认为绝对否定佛教，是一种“知石而不知韞玉”的片面性；韩愈的学生李翱明显地吸取了佛教思想。他写的打上禅学印记的《复性书》，提出道德修养经由“弗思弗虑”的“正思”阶段而到达“动静皆离”、“情性两忘”的至诚道德境界，同佛教讲的由“渐悟”而至“顿悟”的修持方法，实际上差不多。类似的肯定、仿制、吸取进入宋明时期，使儒学发生了质变与飞跃。宋儒以孔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核心，采取了佛道的思辨方法并融合其禁欲主义思想，创造了新儒学——理学。佛学“真如佛性”、“一多相摄”、“月印万川”等思想，启迪二程朱熹一派用“理一分殊”论证封建道德的绝对性与普遍适用性；陆九渊、王阳明一派“心即理”的基本命题与仁义道德“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同禅宗“明心见性”如出一辙。佛教的持戒、禅定、“常惺惺法”和道教的“无欲”、“主静”修身法，也转化为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和“主敬”、“静修”、“致良知”等修养方法。很显然，这种通过对三教的全面比较和扬弃，对传统儒学进行调整和改造，从而汇总了佛道有用成分的新儒学即理学，它以阐发义理代替了训诂，以严密的论证代替了粗俗的迷信，把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空无”之道变成具有人伦物理内容之道，把“经虚涉旷”的宗教修持变成具有真实内容的行为规范，把消极出世、清静无为的宗教神学变为积极入

世，齐家治国的人生哲学。总之，它把封建纲常伦理与哲学理论思维结合起来，将三纲五常上升到天理高度，贯穿到人心深处，使之具有哲学依据与理论化的形式，从而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它的权威性。从此以后，“天理良心”、“天理不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普遍流行，成为在许多领域中起主导作用的政治伦理文化，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影响。当然，处于从属地位的佛道思想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思想，它们在有些方面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三

南朝道士陶弘景说过：“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这不仅是对他那个时代政治、文化、艺术、宗教等学术思想的写照，也大体上反映了整个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的状况。三教九流虽然未能全部概括古代的精神文明，但若把它当作一种指导思想，那么它的涵盖面是非常广大的。而若把它作为宗教学术团体 and 知识阶层，那么它涉及到许多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如法家的法治理论，名家的逻辑思想，墨家对物理学、光学的贡献，纵横家的外交思想与雄辩术，儒家政治伦理，道家的哲学智慧和用兵思想等等。而且，其中许多代表人物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如孔子、墨子、老子都研究过“名”的问题，对认识论和逻辑学都有贡献。他们又讲学授徒，有丰富的教育经验与教育思想。两汉以后，中国学术文化中的各家各派，经过多次碰撞、冲突，从分化走向综合。它们作为“合力”而渗透到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